

闽人遗事

红色印记

林长民留日事迹考

□陈少卿

林长民在今天因林徽因父亲的身份广为人知,在民国时代声名远过其女,是举国瞩目的政治人物。他在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突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似乎是暴得大名。其实他早在留日期间已是风云人物,只是今人对此知之甚少。

现存最权威的林长民传记是梁敬缙的《林长民先生传》。梁氏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林长民的秘书,为写《林传》专门采访了林长民的亲友故旧。纵使如此,《林传》对林长民留日事迹的记载仍语焉不详,并有若干舛误。本文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对林长民留日事迹做一梳理。

林长民是何时负笈东洋的?《林传》的说法是1906年,大多关于林氏的文字也袭用此说。但是,《林传》“注释六”提供了一条与此矛盾的信息:“据早稻田大学致陈登峰先生函,林在该校高等预科三年,成绩均乙等;大学部政经科第一学年乙等,第二学年甲等,第三学年乙等。”可见林氏在早稻田大学前后求学六年。已知他在1909年毕业于该校,那么他留日的年份至晚在1903年。

事实上,与林家有世交的陈与龄在其《林长民及其从兄弟》一文中,已经指出林长民赴日是在1902年。查阅1902年出版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林长民的名字已然在列:“林长民,籍贯:福建闽县;着京年月: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费别:自费;学校:正则英语学校。”

“着京”即“抵达东京”的日语说法。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即相当于1902年公历9月。与陈与龄的记载适相印证。正则英语学校是许多留日学生来到日本的“滩头阵地”,先在这里补习语言、理化等科目后再考取其他学校。陈独秀、章士钊、杨端六等都曾就读该校。在该会馆的《第三次报告》(1903年农历二月)中,林长民的“学校”一栏已变为“预备入校”。按时间推算,这个预备进入的学校就是早稻田大学的高等预科。

林长民热心公益,敢于任事,至晚在1903年初就加入了清国留学生会馆担任书记职务。同时,在该会馆担任职员的名人还有庶务干事钮永建,招待干事蹇念益、邹容,评议员林白水、曹汝霖、章宗祥等。也正是在此时,他因福建展品事件声名鹊起。

在1903年2月,日本大阪举办了劝业博览会,中国留学生秦毓璠等在观展时发现,日方将福建的展品放在台湾馆展出,无疑是

将福建视为日本的殖民地。秦毓璠等向日方提出质问,但因不善日语,沟通不得要领,于是致电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会馆,请速派善日语者来。东京方面遂派出林长民、刘崇佑、林荣三位福州籍留学生赴大阪交涉,随行者还有江南出品委员、福州人李宜襄。

林长民到大阪后得知,福建参展品出发太迟,原本放置国外展品的参考馆已无空地,当时负责台湾参展事宜的参事石塚正在福建,他向福建官员提出可将福建展品放在台湾馆,昏聩的官员竟然答应。得知原委后,林长民等直接与日方交涉,要求将福建展品移出台湾馆,在参考馆的四川陈列所展出。日方负责人本已答应,后来中途变卦要求先征得台湾总督同意。此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刚到神户,林长民等请刚到大阪的福建出品委员冯祥光面见儿玉交涉此事。儿玉知道此事已引起在日华人的公愤,只得答应福建展品移出台湾馆,林长民等的抗争最终获得胜利。

此事经过旅日华人刊物的详细报道,轰动留学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记载此事时,隐去秦毓璠等人的事迹,突出林长民的作用,可见对林的欣赏。梁曾称他和林是“二十年来的朋友”,由此推测,两人结识即在此事前后。林长民成为立宪派,跟这段因缘不无关系。

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29日,沙俄提出延迟从我国东北撤军的七项要求传到日本,留学生群情激愤,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通过了组织拒俄义勇队的决议。林长民在大会上演说,慷慨激昂,鼓掌如雷。次日,林氏就加入义勇队总部工作。

5月2日,义勇队改称学生军。6日,学生军开始训练。7日,日本警察请林长民、王嘉渠到神田区警察署谈话,要求解散学生军。可见林长民是当时学生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8日,学生军本部召开会议,林长民提出为避免当局干涉,学生军改为军事讲习会,受到多数赞同。11日,学生军召开大会,决议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因为清政府的压制,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逐渐冷却,但林长民的沟通、组织、演说能力得以展现在旅日华人面前;其相对温和、灵活的政治态度也初见端倪。不过,此时他并未与激进派分道扬镳。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使清国人入学的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通常所说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自由。所有留学生都反对这一文件,但对于如何应对存在分歧。一部分激进学生成立“各校联合会”,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全部规则,否则以退学回国抗议之。温和派学生则主张部分修改该文件,主要是第九、第十条,且反对以退学回国为抗议手段。

12月24日,温和派学生成立了反对弃学回国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林长民被选为调查员,并捐献会费五十元,为同人之冠。“联合会”和“维持会”的对立,也初步划出了革命、立宪两派学生的分野。这意味着林长民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已经明朗化。他虽反对激进的政治行为,但爱国热情并不逊色。1907年6月,闽县人陈天听从日本回国途中,为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投海而死。不久之后,在东京华人召开追悼会。林长民反对这种一死了之的做法,作挽联曰:“无所效而逃,名曰逃户;忍自戕其命,罪浮杀人。”朋友们都认为他“持论过激”。林长民慨然答道:“今日国势危殆若此,全赖有识之士相与勤力,庶足以图挽救,若人人皆以死了相,徒窃爱国之名,而不举救国之实,前途尚可问乎?吾宁得罪死者,不愿使生者群相效尤,至貽无形之大患。”

1906年,林长民预科毕业,曾短暂归国,同年即回到早稻田,入读大学部政治经济科。早稻田大学为日本明治维新重臣大隈重信手创,初名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升格为大学。政治经济科是该校成立之初就开设的专业之一,师资极为雄厚,有法学家有贺长雄、山田三良,历史学家浮田和民、村松贞臣,政治学家高田早苗,文学家青柳笃恒等。为方便留学生学习,校方组织日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将讲义翻译成中文,林长民参与了这一工作,负责翻译了山田三良的《法学通论》、村松贞臣的《日本维新史》两本讲义,以及浮田和民的演说《公德与私德之辨》。

早稻田大学的法学和政治经济科的学生多是权贵子弟,许多人毕业后将涉足政坛,早在东京专门学校时代,校方即举办“拟国会”活动,并将这一活动列为政治经济科学生的必修课,名为“国会演习”。在这一活动中,教员扮演内阁阁员,学生则扮演议员,分组政党,讨论国家大政,诸如“矿业法案”“日英同盟建议案”,与真实国

会如出一辙,让这些未来的政坛精英提前熟悉议会政治的运作方式。当时的中国正在预备立宪,懂得议会政治的人才凤毛麟角,无怪乎林氏回国之初即被各省大吏争相延揽了。

早稻田大学学生社团活动极为丰富,时人评论说:“任何人经过学生专用校门,随时都会看到数十张贴的传单:如某某同乡会、某某同学会、某州联谊会……”据说,如果真要参加的话,要么每天忙于开会,要么就被迫缴费。“林长民喜爱交友的个性在这里如鱼得水,被推为福建同乡会会长,交友愈发广阔。刘以芬回忆道:“林文采俊美,工书,偶作简札,或古雅可颂。日、英语均娴熟,喜交友,人亦乐于之接,与梁任公(启超)、杨哲子(度)、黄克强(兴)、宋渔父(教人)诸人皆友善。”

1905年之后,刘崇佑、汤化龙等相继赴日留学,成为林长民生活上的挚友和政治上的战友。1906年,梁启超创立立宪团体政闻社,汤化龙、刘崇佑等均名列其中。虽然没有资料表明林长民也加入该社,但他的政治立场属于立宪派是没有疑问的。当时的日本,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正酣,看似势不两立,而林长民看到了两派合作的前景,与黄兴、宋教仁等一直维持着良好私交。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他回答说:“凡政治家首贵气度恢弘,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私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

他回到福州后,与同盟会员林斯琛、郑祖荫等保持良好关系,并合办《建言报》。福建辛亥革命十分顺利,得益于革命、立宪两派的密切合作。这与林长民团结革命派的方针分不开。

综观林长民的人生,其“政治资本”在留日期间已经基本奠定。预备立宪中,是刘崇佑请他出任福建咨议局局长,开启他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后,是梁启超、汤化龙和他携手组织进步党(后演变为“研究系”)让他成为众议院秘书长。

难能可贵的是,他留日而不媚日,在巴黎和中国利益被出卖的关键时刻,投身五四运动,至今仍是一段佳话。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乡土琐记

林浦泰山宫:最小的皇帝行宫

□周兴文 乔玉洁 文/图

林浦泰山宫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瀛江村。原为平山阁,因南宋益王赵昱曾驻蹕于此,后改称泰山宫。泰山宫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小的皇帝行宫,也是福州唯一保存完好的宋帝行宫。

明朝林瀚曾作《平山怀古》:“翠金舆载恨游,岂缘南越觅丹邱。钟声落日孤村寺,海色西风万里舟。王气清沉天地老,胡尘漠漠古今愁。伤心最是瀛江水,还绕行宫山下流。”林炫(林瀚之孙)次韵:“聚景湖山作意游,谁知闽海有平邱。百年庙社三春梦,万里风涛一叶舟。落日鼓鼙寒不起,中原草木惨多愁。至今遗恨江心水,石激潮声夜夜流。”描述了林浦泰山宫的景色和历史背景,表达了对历史的感慨。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元兵攻破临安,皇族南奔。益王赵昱和信王赵昺及大臣、将士在瀛浦的古码头岐峙登岸,赵昱就驻蹕在平山并建了行宫。五月,益王在陈宜中、张世杰拥戴下在福州登基,是为端宗。元兵攻破福州后,村民为了保护行宫,将其改名泰山宫,躲过一劫。

泰山宫坐落于林浦平山之麓,瀛水之滨。主体建筑坐东朝西,背靠山脉,面临江水,形成了“背山面水”的理想格局,符合风水学中的“高山藏风,深水纳气”的原则。如此选址有诸多优点:宫殿周围的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景色宜人,有助于聚集自然的气场;地势高燥可以避免水患和湿气的影响,有利于居住者的健康;易于防守且交通便利,有利于宫廷的安全和日常运作。

整个行宫占地面积1484平方米,中轴对称式布局,由泰山宫、天后宫、总管殿组成。宫前还有校场,可容纳500多人集会,为朝廷当局发布重要御旨及点将场所,校场两侧各有一棵千年古榕,传说为宋代栽种。

泰山宫由门亭、大殿、戏台、厢楼等建筑组成,正殿前建有门亭,巍然于高台之上,两侧砌有石阶供人拾级而上。门亭外立着两尊武将雕像,左边是李将军,右边是杨将军,他们都是宋帝的亲卫大将军,负责保护宋帝及皇室成员的安全。亭中的雀替悬钟样样精细。核心大厅被用作祭祀的场所,在大厅中央供奉着泰山王,左右两侧则是皇太子的形象,两侧墙壁上绘有五府六部的壁画。戏台四周有三国时期典故的浮雕,栩栩如生,两侧设有厢楼。穹顶内有三方藻井,正中为椭圆形,绘刻着“双龙戏珠”,左右两侧则拥卫着“丹凤朝阳”,四方形的构图和细腻的雕刻工艺都展现了



泰山宫

了古代建筑的高超技艺。同时,藻井的色彩运用也十分丰富,以红、黄、绿等鲜艳的颜色为主,使得整个空间显得热烈而庄重。

天后宫位于泰山宫正殿右侧,供奉天上圣母、海上女神妈祖。据说该殿原祀南宋端宗之母杨淑妃,后改祀天后,与泰山宫、总管殿等建筑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庙宇建筑群。天后宫的主体建筑正殿坐落于高出地面1米的基座上,殿顶为九脊重檐四面落水的歇山顶。正脊是天后殿最高点,两端有五色彩绘的双龙戏珠,造型精美,四岔脊头组合凤凰图案,对应大脊构成龙凤呈祥,背面做人物故事,配以龙凤、麒麟、玄武、双虎,体现了吉祥如意、庆贺长寿的象征。建筑色彩以红色为主,搭配以金色、黑色等辅助色彩,形成了鲜明而和谐

的视觉效果。建筑上的装饰图案以传统的神话故事、动植物纹样为主。



总管殿

的视觉效果。建筑上的装饰图案以传统的神话故事、动植物纹样为主。总管殿位于泰山宫正殿左侧,殿内供奉的主神为“总管爷”,是林浦地区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祇之一。殿内还保存有一些历史文物和古籍,如明清时期的碑刻、神像等。南宋宰相陈宜中曾手书“平山福地”匾额,悬于总管殿上。现存的“平山福地”四字是后人林之夏手迹。总管殿的建筑风格与泰山宫整体相协调,采用了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屋顶覆盖着青瓦。建筑细节也极为精致,如斗拱、檐口、门窗等部分都采用了精美的木雕和装饰。

校场侧旁的古榕高22米,胸围径14米,冠幅28米,是福州乃至福建省迄今为止已知胸围最大、主干最粗的古榕。据传,当年督署裴真人就是在这棵树下羽化的,因此这棵树也被誉为“商界保护神羽化之树”。每年农历正月廿三日的“迎泰山”大典,信众们会在这棵古榕树下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宫前还有一古码头从岸上延伸到江边。在江边一块不起眼的巨石头上,可以看见当年南宋端宗坐船从杭州逃到福州,船行至此登岸时,纤夫拉纤摩擦石块留下的纹路和系船绳的孔。离登岸码头不远处有一条石头铺就的“御道街”,据说因当年端宗在此走过而得名。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闽西南革命阵地科岭

□韩向铎

科岭是闽西南地区的革命重要阵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基点村。科岭村位于漳州市西北部,隶属南靖县梅林镇,东与奎洋镇接壤,西与龙岩市永定区交界。在民主革命的峥嵘岁月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领导广大军民浴血奋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为闽西南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0年3月,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之后,闽西红军不断拓展红色区域。在邓毅刚、江桂华等闽西革命运动领导人的带领下,闽西红军多次挺进南靖西北地区,东与奎洋镇接壤,西与龙岩市永定区交界。在民主革命的峥嵘岁月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领导广大军民浴血奋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为闽西南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0年3月,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之后,闽西红军不断拓展红色区域。在邓毅刚、江桂华等闽西革命运动领导人的带领下,闽西红军多次挺进南靖西北地区,东与奎洋镇接壤,西与龙岩市永定区交界。在民主革命的峥嵘岁月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领导广大军民浴血奋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为闽西南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4年春,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八团(简称“红八团”)深入科岭,建立群众游击武装,以积极的游击行动破坏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运输,牵制迟滞敌人向苏区的进攻,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红八团开辟了以金丰大山为中心的永东游击根据地,将(龙)岩永(定)(南)靖交界区作为活动的基地。是年冬,岩永靖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此区域很快成为红九团和红八团联络配合、会师接头的纽带,在闽西南游击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4年7月15日,在红八团军政委员会的帮助下,在上科岭村恢复重建了领导南靖、永定、龙岩、平和四县边区的岩永靖北区苏维埃政府。为了加强岩永靖边区的地方工作,1935年1—2月间,红八团军政委派遣李明康、廖庆兴、肖振忠等同志组成一支10余人的武装工作队,前往该边区开展工作,以建立健全党、团和武装政党组织。工作队由李明康率领,在岩永靖边区的乡村山寨秘密串联,发动群众,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永定龙潭、南靖科岭组织起两支各有50余人的游击队。1935年8—9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在科岭成立了岩永靖军政委员会,岩永靖边区的革命斗争自此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对闽西南边区进行了多次的“清剿”,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也有广东军阀,还有地方反动民团,兵力最多时达到5个整编师。在敌人的野蛮蹂躏下,科岭全乡人口从1930年以前的1201人到1951年只剩下496人。为了打破敌人的“清剿”,根据地人民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斗争。1935年初,李明康率领的科岭工作队发展、组建了队员达30余人的上马游击队,开展了多次伏击行动,歼灭多支反动民团,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当时的相关媒体还对科岭的游击队进行了报道。如1936年2月16日《红色中华》报道“蓬勃发展的闽西南的赤色游击战争,在杭永岩永安一带还存有大批苏区,当时红军非常活跃”。1936年2月,闽西南军政委印发红色赤卫队《捷报》。1936—1937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红八团、红九团的红军战士们在闽西南边区取得了一次次胜利,给予敌人沉重打击。1937年2月,邓子恢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在与粤敌“清剿”斗争中我们的胜利》,昭示着闽西南革命的巨大成功。

1936年初,在积极进行反“清剿”的同时,为了响应抗日救国的号召,闽西南军政委将红军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是年,邓子恢起草《抗日布告》,号召闽西南各界“集中力量,共同抗日讨蒋”。1937年4月15日,闽西南革命三大会议之一的科岭会议在科岭村召开。会议制定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设计了闽西南地区实现联合抗日的蓝图。这是闽西南的革命斗争由“抗日反蒋”走上“联蒋抗日”的重大转变,它为此后在闽西南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谈奠定了基础。1937年5月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的纲领》《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致粤军公函》。同一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还签署并发布了《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这些文件集中表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于和平谈判、促进国共合作的诚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起的这一合作抗日运动,很快就得到了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和拥护。

1938年1月28日,谭震林从军部接受命令返回龙岩白土,正式宣布将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和闽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这标志着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在闽西南边区实现。1938年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白土整编,将南靖科岭、版寮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入第三团,并举行了盛大的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向边区父老乡亲表达了勇往直前、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3月1日,南靖人民的优秀儿女从龙岩白土整装出发,开赴苏皖抗日前线,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夙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无心和谈,反而加紧对解放区的军事“清剿”,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包括科岭在内的各基点村。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罗炳钦、张昭娣、邱锦才等同志分别带领工作队和闽西、闽南支队的部分同志,先后进入科岭,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武装,实行“二五”减租,抓地土,筹款粮,配合南下大军完成解放福建的神圣使命。1949年9月1日,参与解放龙岩城的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十三团、二十一团奉命沿漳龙公路直下,消灭了和溪、金山守敌。22日下午,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二十一团在闽粤赣边纵队闽西南临时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李仲先、团政委于华率领下,奉命回师解放山城,当日南靖县宣告解放。科岭人民就此成为国家的主人。

革命历史因铭记而永恒。2010年,南靖县委、县政府在科岭村下斜翻身楼建设了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并于2015年对设立于1963年的科岭革命烈士纪念馆进行翻新。2017年,南靖县委、县政府在科岭创办科岭红色党校。如今的科岭已成为福建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内主题教育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